

### 主題三 王道善治與新世紀的全球化

## 王道與中國道路

中華文化學院 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

### 于銘松

摘要：民族復興需要文化價值支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同樣需要價值觀的支撐。兩千多年前孟子提出的“王道”思想是歷經幾千年變遷和社會實踐而被證明有利於人類生存發展及社會進步的精神財富，完全可以成為普世價值，為民族復興提供價值支撐。

在當代，中國的發展成就已經引發全球的關注：經濟、科技逐漸強起來了，中國對事關國家大政方略的財政投入能力空前提高，甚至讓西方老牌發達國家瞠目。但是，這只意味著“財大”，並不意味著“氣粗”，在世界文明對話的舞臺上，中國還需要形成與經濟實力相匹配的，影響西方的文化和價值觀。而恰恰最終決定民族命運的，主要取決於文明和文化。一個有著遠大理想和抱負的民族，絕對不應迷信一時的金錢和財富力量。它可以信賴的，是價值觀力量；它可以信賴的，是信仰的力量；它可以信賴的，是制度的力量。而這一切，可以從中華傳統文化蘊含的“王道”思想中尋找到答案。

何謂“王道”？“王道”這一概念最出於《尚書·洪范》：“無偏無党，王道蕩蕩；無党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孔穎達疏“王道”即“王者所行之道”。而“王道”思想是孟子所大力宣導的。他對“王道”的闡釋是：“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孫醜上》）“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林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的“王道”思想，在其後雖被歷代的思想家發展，但其基本的含義沒有改變，其一，“王道”是以仁義道德為本；其二，“王道”以民本為基礎。這一思想是歷經幾千年變遷和社會實踐而被證明有利於人類生存發展及社會進步的精神財富，完全可以成為普世價值，為民族復興提供價值支撐。同時，我們應以更加積極、開

放的心態，傳達出我們的價值觀，以此來回應世界對民族復興的疑慮和猜忌。

一、以仁義為內核的“王道”，可以為中國道路提供價值支撐

1、以仁為內容的“王道”，可以打消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疑慮

孔子提出了以“仁”為核心的一整套學說。孔子關於“仁”的論述很多，最基本的是仁者“愛人”和“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

仁的具體含義是“愛人”，即是一種博大的同情心，凡是人都有仁性，天生的惻隱心，能對別人的痛苦與歡樂產生共鳴；仁是一種寬容忠恕的精神，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仁還是一種效、忠的品質，能做到在家庭、家族內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社會生活中“忠君愛國”。

“仁”在這裡實際上是人的完美的品質修養和高尚的精神境界。孔子企圖用溫柔敦厚的君子人格，來規範人們的修養，進而調節人際關係，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

而“克己復禮為仁”，意思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言行視聽都合乎“禮”的要求，這樣就達到“仁”了。這就涉及到“仁”與“禮”的關係。如果說“仁”是人的完美的品質修養和高尚的精神境界，那麼“禮”就是制度、規範。“仁”是內在的自覺性，“禮”就屬於外在所強制力。通過外在“禮”的強制作用，可以促使人的內在品質修養和精神境界達到“仁”的高度，而內在的品質修養和精神境界的提高，又會促使人們自覺按照“禮”的要求行事。兩者相互作用，可以造就出完美的人格現象。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不僅為“仁”找到了人性的根據，即人天生就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種善端的萌芽，經過一番“修身”、“養性”的培養，就可以發展成為仁義禮智“四德”。而且他進一步昇華出“王道”思想。孟子曾在《公孫醜上》中說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裡，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在這裡，是在講他的王、霸道之分。其中所說的“王道”的代表，是“以德服人”的商湯和周文王。而所謂“霸道”的典型，則是春秋時期以“尊王攘夷”為旗幟，通過“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成其霸業的齊桓公和晉文公“假”，借也，“以力假仁”而霸，就是以力為後盾，借仁的名義而稱霸。

當前，有人擔憂中國是否文明的崛起。龍應台女士在北京大學百年講堂的演講《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就流露出這種擔憂。她在演講中說：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如何衡量文明？我願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裡，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何謂衡量文明的尺度？這就是“王道”，而非“霸道”。以仁為內容的“王道”，可以打消人們對中國崛起的疑慮。

## 2. 以義為內容的“王道”，可以塑造中國的大國形象

(1) “義”，一指正當、正直和道義的氣節，即“正義之氣”。“大義凜然”、“大義滅親”、“仁至義盡”、“捨生取義”、“見義勇為”等，都是讚頌有關的人和事、行為和品質。同時也用大量的貶義詞，來鞭撻與此相反的現象，如“背信棄義”、“忘恩負義”、“假仁假義”、“見利忘義”、“多行不義必自斃”等。這一褒一貶，把弘揚道義的民族傳統，襯托得格外鮮明。

“義”往往與“利”相對應。利則泛指個人利益、功效。在義與利的關係上，儒家主張“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號召人們努力去追求義，即社會公利，為社會多做貢獻，用社會公利限制、約束個人私利，“見利思義”（《憲問》）。

中華傳統義利觀，強調重義輕利，臨財不苟，所謂“正其宜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記其功”，崇尚個人內省和道德完善，講究安貧樂道，鄙薄排斥市場經濟追求利益最大化，這一觀念曾壓抑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但其對市場經濟求利特性帶來的拜金主義氾濫和道德墮落的警惕和批判，對道德標準的堅持和推展，以及以義為根本長久之利的認識，又具有特殊現實意義。

目前，中國經濟總量 GDP 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現有的發展模式下，中國對中東、非洲等國家的能源的需要，對歐美市場的依賴，還將長期存在，打消人們對中國的疑慮，應該正確處理義與利關係，應“見利思義”，而不應當“背信棄義”、“忘恩負義”、“見利忘

義”，據此，中國應更多地承擔與其經濟地位相匹配的國際義務，而不應該只知道“油水情”，而忘了“魚水情”。

(2) “義”，二指公義，即公平和正義。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大量關於公義的思想。《禮記·禮運》中設想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即是公義之道的體現。亞理士多德提出，對於同等者予以同等對待，不同等者不同等對待，即是公義。在西方政治哲學中，公平與正義是基本的價值之一，公義原則被視為社會組織的第一原則。公義原則基本上表示道德的普遍性、平等性和無私性，因此，公義幾近乎道德的本義；而當一個社會不公義或一個人受到不公義的對待時，這個社會就是一不道德的社會，即有必須加以改正的需要。因此維持公義，是民主社會的責任，公義不張，民主就不存在。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一直致力於從根本上解決社會不公的問題，但是，自九十年代以來，腐敗橫行、社會不公的現象卻反而日甚一日。中國的腐敗和與之相伴隨的社會不公之所以會發展到目前這麼嚴重的局面，究其原因，改革自覺或不自覺地偏離、甚至違背了大多數人所能接受或認可的關於社會公義的標準；因而改革本身的深化，也便難免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腐敗和社會不公日益積累和日益惡化的過程。比如，尋租現象氾濫。很明顯，尋租現象的氾濫，是基於官僚特權的存在。再比如，社會階層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從改革的收益分配和代價分擔是否相稱的角度來分析，存在於中國不同階層之間的社會不公，主要表現在二元結構框架內的城鄉關係和官民關係。特別是官民之間在收益所得和改革代價承擔上的不公正，已經引起公憤。在改革中收益最大的官員及其家族成員，付出的代價和承擔的風險最小；而收益最小的普通百姓卻不得不付出最大的代價、承擔最大的風險。這些問題不解決，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民族復興。

## 二、以民本為基礎的“王道”，是中國道路的民意基礎

孟子的“王道”思想，以性善的人性論為基礎，提出了“仁政”學說。“諸侯之三寶：土地、人民、政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這些“重民”的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此為出發點，發展出“德治”和“仁政”。

所謂德治，就是要以德化民，用孝悌、忠恕、仁義、誠信、禮讓、智勇、廉恥、中和等德行教育人民，提高民眾的道德素質和道德自律，使他們能自覺遵守各種道德和法律的規範。他們因此而反對對民眾只事嚴刑峻法而不施以道德教化的暴政，而主張“仁政”。仁政對為政者提出較高要

求，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論語·子路》）。由此看來，他要求為政者要“正”。所謂“正”有三方面含義：一是正身，就是要修身，這是從內聖到外王最起碼的立足點。二是廉潔。廉政是仁政最起碼的內容。要求為政者欲而不貪，見利思義，廉政為民。三是勤政，主張為政者勤於政務，體察民情，關心民眾疾苦。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從“愛民”的觀點出發，主張為政者要得民心，順民意，不可逆民。一個政權的興衰存亡全在於是否得民心，得民心，人民擁護你，政權就穩固，失民心，人民離心離德，政權就不穩固，遲早要滅亡。孟子說：“桀紂之失之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荀子則形象地概括為“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白居易說：“邦之興，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白居易集》卷六二《策林·辯興亡之由》），總之，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結論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當然，民本主義思想作為治國安邦的一種指導思想，是為大一統專制政權服務的，仁政的目的是要強化其統治，而不是有的學者所提出的實行民主，民本主義思想在大一統的封建社會中不可能發展出民主政治，最多只是德治、仁政。實際上，民主與民本有本質區別：在內涵上，民主是一個政治概念，它所表徵的是一種政治訴求，而民本則是一個道德概念，它所表徵的是一種道德訴求；在價值目標上，民主是通過對政府權力的制約，防止社會政治權力被少數人所濫用，從而達到保護大多數人利益的目的，而民本的出發點則是解決國家政權的穩定和長治久安問題。民本理論雖然還不是一種民主理論，但它肯定國家社會民為本，就是肯定了人的生存權、發展權，肯定了人民的自主權利。在當代中國，民本思想是可以發展出民主政治，從而為民族復興和長治久安奠定基礎。

### 三、以和合為途徑的“王道”，是中國道路的坦途

中華文化尚和合，強調普遍和諧、和而不同。普遍和諧意識有這樣幾層含義：自然的和諧，自然本身存在整體的和諧；天人和諧，強調“天地人”的整體和諧，“天人合一”；人際和諧，強調人與人關係的和諧，儒家宣導建立起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以“中道”為德性基礎，從而達到社會的和諧有序；身心和諧，強調人的形體與精神的和諧，儒家的“修身”為身心內外合一提供有意義的思想資源。和而不同的理念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智慧和待人處事的博大胸懷，由此所培育的政教倫理與道德情性

品格，成為了古代哲學形而上理論的支柱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精神內核。和而不同是社會事物和社會關係發展的一條重要規律，也是人們處世行事應該遵循的準則，是人類各種文明協調發展的真諦。”

西方文明崇尚競爭，“普世主義”導致文明衝突。西方文明自然並非洪水猛獸，但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西方文明富於進取精神與發展精神，它追求征服自然、揭示社會與自然奧秘，尊重並強調商業精神、創造精神與冒險精神。但西方文明也表現出了明顯的競爭性、排他性、侵略性，在導致國內社會關係、人際關係緊張的同時，也導致國際關係的緊張。這是一種佔據主動態勢、侵略型的文明形態。這是近代西方炮艦政策和現代文化殖民的內驅力。世界上許多戰爭都為兩類原因而打：一是對世界各國物質資源進行掠奪與佔領，為了資源，西方大國在傳統工業化時期對殖民地、能源、戰略運輸通道、規則制訂權的爭奪。二是對世界各國進行意識形態擴張與滲透。例如中世紀的宗教戰爭、西式民主的強勢推進、文明的衝突等。特別是近代以來的西方文明由於種種原因，沒有解決好這兩個問題，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造成了人類史無前例的災難。

21世紀以來，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多元文明的日益接近，但西方文明內部產生的問題以及西方文明對非西方多元文明的卻依然咄咄逼人。西方中心主義者聲稱，西方文明具有“普世性”。亨廷頓說：“西方的普世主義信念斷定全世界人民都應當信奉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因為它們包含了人類最高級、最進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現代和最文明的思想。”<sup>1</sup>他們將西方的“人權”、“自由”、“民主”、“平等”等當作“普世價值”，加以推廣，以期改造儒家、伊斯蘭、日本等文明，這是西方文明的傲慢和偏見。在西方的策動下，中東果真發生了“革命”。然而，“革命”的後果卻超出了美國及世界各國的預料，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槍桿子裡面卻沒有出民主。現實是推翻了薩達姆這樣的大魔鬼，沒想到卻放出了無數小魔鬼，比如伊斯蘭國……。這導致了人類社會新的文明危機。能否化解衝突，則考驗著各種文明和各種文化之理性溝通與價值判斷的能力。

中華文明尚和合的相與之道，是協調人類各種文明的真諦。從歷史上看，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王朝即使處於軍事和綜合實力的優勢地位，也絕少主動挑起過大規模對外戰爭。幾千年來，接受中華文明滋養的歷代政權信奉道義政治、懷柔遠人、天下歸心，堅持“禮”的制度、“道義”話

---

<sup>1</sup>薩繆爾·亨廷頓(S·P·Huntington)：《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 劉緋 張立平 王圓 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299-358頁。

語權<sup>2</sup>、“王道”的理念；從現實上看，崛起的中國既沒有對弱國進行過壓迫和掠奪，無稱霸、無擴張、無殖民、無掠奪、無弱肉強食的炮艦政策，無強加於人的不平等條約，也沒有對強國一味順從和屈服，縱然曾經有過深重苦難，依然渴望著和平崛起、依然堅持著中國道路、依然保持著不卑不亢。

當前，“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出，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恐怖主義、網路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人類面臨許多共同挑戰。”“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sup>3</sup>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再次向世界傳遞對人類文明走向的中國判斷：全球化的問題需要從中國文明中尋找力量，化解難題，彌合分歧、形成共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人民的夢想同各國人民的夢想息息相通，實現中國夢離不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正確義利觀，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並蓄的文明交流，構築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sup>4</sup>

中和型的中華文明，守中致和、中正仁和。當中華文明穩健走向復興，就意味著“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的到來。中國迎來了一個新時代，一個引領世界現代化的中國式文明時代。

---

<sup>2</sup>潘嶽：《中華文明要為建構人類共同價值提供重要支撐》，中華文化學院網站，2017-01-04。

<sup>3</sup>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頁。

<sup>4</sup>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頁。